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荷马注疏集

程志敏 张文涛 ● 主编



[加] 普拉宁克 (Zdravko Planinc) ● 著

# 柏拉图与荷马 ——宇宙论对话中的诗歌与哲学

Plato Through Homer:  
Poetry and Philosophy in the Cosmological Dialogues

易帅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ÈS

荷马注疏集

程志敏 张文涛 ● 主编



# 柏拉图与荷马

## ——宇宙论对话中的诗歌与哲学

Plato Through Homer:

Poetry and Philosophy in the Cosmological Dialogues

[加] 普拉宁克 (Zdravko Planinc) ● 著

易帅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与荷马 / (加)普拉宁克著; 易帅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经典与解释·荷马注疏集)

ISBN 978-7-5675-6083-3

I. ①柏… II. ①普… ②易… III. ①柏拉图(Platon 前 427 - 前 347)-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6709 号



*Plato Through Homer: Poetry and Philosophy in the Cosmological Dialogues*

by Zdravko Planinc

Copyright © 2003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 - 2016 - 712 号

## 荷马注疏集

## 柏拉图与荷马

著 者 (加)普拉宁克

译 者 易 帅

审读编辑 纪 盛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5.2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083-3/B · 1063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 中译本说明

柏拉图与荷马的关系历来都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如本书作者普拉宁克(Zdravko Planinc)如此“彻底地”把柏拉图的著作完全凭靠在荷马史诗(尤其是《奥德赛》)上,这倒不多见。这种独特的视角无疑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界,同时也因其极端性而留下了很大的讨论空间。柏拉图诚然是在重新书写荷马与赫西俄德,把苏格拉底塑造成勇士(英雄)、先知(祭司)、灵魂的引导者,<sup>①</sup>但苏格拉底的这种形象究竟接近甚至等同于奥德修斯还是特瑞西阿斯,很难简单地裁断。柏拉图借用传统的资源,尤其大量地借鉴了荷马史诗的内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否如本书所认为的那样,柏拉图对荷马简直亦步亦趋,甚至生搬硬套,恐未尽然。

首先需要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如何阅读柏拉图”。普拉宁克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把柏拉图当作形而上学家并试图在后者的著作中艰难寻找“理念论”之类的学说,然后把西方哲学的危机算到柏拉图头上,让柏拉图来为后人的不肖埋单;作者也不认同最近一两

<sup>①</sup> 参奥康纳:《重书柏拉图戏剧中的诗人角色》,见费拉里编:《柏拉图〈理想国〉剑桥指南》,陈高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页 56,60—61,69,73,76,83。另参 C. H. Zuckert, *Plato's Philosopher: The Coherence of the Dialogu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 754 n. 15。

个世纪以来古典语文学家的繁琐分析和历史学家代价高昂的实证考古,相反,作者接过尼采的“欣赏”(relish)和“享受”的态度(《超善恶》224),明确提出“美学愉悦说”(aesthetic pleasure)的解读思路,在作者看来,

要想在这个经历了数个世纪建造而成的复杂迷宫中找到出口,也实在过于麻烦。就像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阅读柏拉图的作品也应当是一种享受。柏拉图对话属于文学作品,它与莎士比亚的任何一部肃剧或谐剧一样,都是经过精心琢磨而创作出来的,并非试图撰写普罗提诺《九章集》或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那样的作品却遭遇失败。阅读柏拉图对话所产生的审美享受,是帮助我们理解文意的最好向导之一。  
(页 6,易帅译文,下同)<sup>①</sup>

所以作者不无道理地主张:“只有将柏拉图对话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我们才似乎算得上是按照柏拉图自己的意思来对他进行最好的解读”(页 9)。这对过于理论化的阐释史来说,虽不无矫正之功,领受了这份恩赐的我们却必须明白文学解读的界限,就正如我们已经意识到哲学化解释的弊端一样。矫枉过正的做法必然利弊兼有。我们不能对浩如烟海的研究视而不见,所谓“面对文本本身”,固然是经典解释的基本工作伦理,但仅限于此,就会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

我们不能怕“要杀出一条血路过于麻烦”(too troublesome to fight through)而丢弃数个世纪的研究成果,仅以阅读的享受来代替学术的积累。作者却没有在书中向读者介绍古往今来如此多的研究力作,也没有在古典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朗吉努斯、西塞罗

<sup>①</sup> 指原书的页码。

等人那里寻找灵感和启迪,这种过分的自信使得本书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与此相应的是,这部篇幅很小的著作却多有重复的言辞,显得有些啰嗦。

在如何解读柏拉图的问题上,作者认为,现代和后现代各式各样重建柏拉图“哲学”的努力终究“不得要领”(miss the point,页8),尽管作者的所谓“审美愉悦”其实也是现代人曾经热捧因而泛滥成灾的过气理论。作者虽不认同后现代的解释,却在注释中多次提到德里达,不仅明确表示“认同”,甚至把德里达的《药》和《空间》视为他最喜爱和最享受的研究,尽管有所保留。<sup>①</sup>让我们觉得不可理解的是作者对古典语文学家的态度:普拉宁克认为他们的研究对我们也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再也没有任何重大的语文学问题阻碍我们理解文本了”(页9),这多少有些“昧良心”,假如没有他们的工作,我们很难读到可靠的文本,更不用说理解其字词的基本含义了。没有小学功夫,任何微言大义的钻营都是自说自话。作者至少应该参考古代注疏家(scholiast)的成果。

施特劳斯学派也重视文学性的解读,更重视“按照柏拉图自己的意思来对他进行最好的解读”,<sup>②</sup>因此,简单梳理一下普拉宁克和施特劳斯学派的关系,不惟有趣,也有助于帮我们更好地评价这本书,并进而更为深入地思考柏拉图与荷马的关系。普拉宁克虽然明确地宣布施特劳斯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即诗与哲学是源自人性深处的对立两极)无关紧要,但他认可柏拉图著作的文学性并极力主张摆脱历史学家的索隐、语文学家外在的远观、康德和奥古斯丁的哲学批判、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切割(页6),重视其辩说

<sup>①</sup> 原书页11,49,75,84的注释。

<sup>②</sup> 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再生》,郭振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页279。另参氏著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4, p. 52。

(dialogic)和谈话(conversational)的特质(页9),却无疑响应了施特劳斯学派的号召——当然,仅仅重视文学这个维度,无疑既有所不足,也是在“文学解读”的路上走过了头了。

普拉宁克在该书正文之前的题记中转引了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致沃格林的信,其中说德国诗人兼翻译家格奥尔格甚至比世界知名的古典学者和柏拉图专家维拉莫维茨和耶格尔更懂柏拉图!题记中另外引用的两位作者的身份也颇有意思。施特劳斯排在第一,接下来是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但在普拉宁克的书中再也没有提到此人),她受过严格的哲学(和古典学)训练,后来教授哲学,也写过一些哲学著作,但她真正闻名于世的作品都是(哲理)小说,或者说她以小说的方式来讲述哲学,而她的哲学著作和哲理小说却主要是对包括萨特和维特根斯坦在内的哲学家的批判,可能是因为默多克深受薇依(Simone Weil)和柏拉图的影响,号称要在他们的旗帜下为他们战斗。普拉宁克题记中最后引用了一位多次获得格莱美大奖的流行音乐家莫里森(Van Morrison, 1945—)的一句歌词,其主题就是“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爱夸上了天(praised it to the skies)。施特劳斯是学院中人,默多克是学院中的槛外人,莫里森是学院外的人,我们不知道作者以年龄还是以重要性来排列这三位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仅仅从题记的引用及其编排顺序来看,普拉宁克这部著作必有新意。

仅仅从书名来说,普拉宁克这本书很容易让人想起伯纳德特的《弓与琴》<sup>①</sup>,前者以荷马来解读柏拉图,后者以柏拉图来解读荷马,堪称两种相互对立的模式——普拉宁克在自己这本书中没有

<sup>①</sup> Seth Benardete, *The Bow and the Lyre: A Platonic Reading of the ‘Odysse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中文见伯纳德特:《弓弦与竖琴——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程志敏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本书修订本由华夏出版社2015年再版)。

提到《弓与琴》，却提到了伯纳德特。<sup>①</sup> 普拉宁克曾经为《弓与琴》撰写过书评，因此我们大约可以说，他这本书就是直接针对伯纳德特的。普拉宁克在五年前那篇书评中坚持古人解读荷马的立场，即把《荷马史诗》当作文学作品，而非任何形式的哲学著作，以此来批评伯纳德特的解读：伯纳德特把《荷马史诗》视为“柏拉图式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以为荷马乃是柏拉图的先声(anticipating Plato)，在普拉宁克看来，这显然是受了乃师施特劳斯“神学—政治问题”的误导，因为“《奥德赛》中的哲学乃是具有欺骗性的简单问题”。<sup>②</sup> 伯纳德特未能区分史诗诗人的叙述和诗中人物的话语，这种平面化的理解(flat understanding)和“让人惊讶地新奇”的解读乃是一种“危险的解释学”(a dangerous hermeneutic)。<sup>③</sup> 且不说普拉宁克和伯纳德特究竟哪一方才危险，他们的研究对我们来说必然都有助益。

作者的核心观点是要把柏拉图著作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而作为西方文学作品始祖的《荷马史诗》便是当然的楷模，作者认为前者甚至就是在模仿后者，因此尤其说柏拉图对话是诗歌和哲学的混合，不如说是文学的盛宴，哲学最终成为了诗歌的附庸：<sup>④</sup>

---

① 正文中提到的是伯纳德特翻译的《会饮》，注释中引用过两次 Seth Benardete, 一次是伯纳德特的 *The Rhetoric of Morality and Philosophy: Plato's "Gorgias" and "Phaedru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一次是伯纳德特在《解释》(Interpretation)上的一篇文章(On Plato's *Timaeus* and *Timaeus'* Science Fiction)。该杂志是施特劳斯学派的阵地，普拉宁克也在该杂志上也发表过两篇论文，一篇是 Ascending with Socrates: Plato's Use of Homeric Imagery in the *Symposium*(2004 年夏季号, 页 325—350), 另一篇讨论莎士比亚的《李尔王》(2001 年冬季号, 页 171—185)。

② Z. Planinc, Anticipating Plato, in *Review of Politics*, 60/4 (1998), p. 810.

③ Ibid, p. 812.

④ 相反的观点见张文涛：《哲学之诗》，华东师大出版社 2012 年，页 67—68, 页 146—155, 页 219—220。

学者们通常都承认柏拉图对话是诗歌与哲学的混合。然而,一旦他们试图将后者从前者中抽离出来,分歧便产生了,此外,他们还通常过分纠缠于细节问题,比如哪些篇章或论点可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以至于完全忽视了在解释柏拉图作品时的主要难题。按照对哲学本质的现代理解来看,哲学与诗歌有着不言而喻的区别,但柏拉图对哲学的理解则完全不同。他认为,哲学在其最高形式中与最好的诗歌无法区分。(页7)

作者敏锐地看到,从哲学与诗歌的对立中抽去后者,仅仅以“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来研究柏拉图,的确容易忽视经典解释的主要难题。自十九世纪德国专业哲学家以来的柏拉图研究(Platonic scholarship)因为没有看到柏拉图对话这个最为外在的形式而在哲学解释上走得太远,以至于很可能肢解、曲解和误解了柏拉图。但普拉宁克似乎又在相反的方向上同样有些误入歧途。

首先,哲学与诗歌“不言而喻的区别”并非现代人的理解,这种对立或争吵在柏拉图时代早就是“古已有之”。普拉宁克当然知道这个常识,但由于过分偏重于文学(诗歌)的解读而试图以驱逐哲人的(相反)方式来消解哲学与诗歌之间的冲突。作者清楚地看到哲学与诗歌之间已经由争吵升级为公然的对抗,并因此试图重新弥合它们之间的裂隙,但这种以诗歌来统合哲学的方法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反而还可能加深它们之间的鸿沟。

其次,柏拉图对哲学的理解无疑与现代人大不相同,但未必就能够达到“在其最高形式中与最好的诗歌无法区分”的程度——我们需要特别仔细分梳这种比喻性的说法才能明白其深刻含义,否则它就会是大而不当的糊涂话。苏格拉底临终前才开始“作诗”,但他的“诗”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而他所谓“哲学乃是最伟大的音乐”(《斐多》61a)也不是单纯为哲学张本,而毋宁说哲

学与音乐(诗歌)的相通首先需要以各自的差别为前提,否则“诗化哲学”和“哲性诗学”都无从谈起。<sup>①</sup>

上述问题可以具象为柏拉图与荷马的关系,普拉宁克的论据是“《斐德若》体现了柏拉图对荷马的友爱之情。最好的哲学与最好的诗歌是相顺应的;它们之间不应有争论”(页8)。但这真是柏拉图的“原意”吗?即便如许多后现代理论家都认同的那样,以非理性为基础的诗歌对哲学十分有益:可以使哲学更加地哲学,但这不正好说明诗歌与哲学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不同思想方式因而它们之间虽可互补却必然有着本质的区别吗?

普拉宁克把柏拉图涉及到“宇宙论”的主要著作,如《斐德若》、《蒂迈欧》、《克里提阿》、《王制》和《法义》,视为一个整体,并且都是《奥德赛》剧情的诸多片段,或者都在局部重新刻画荷马史诗,固然有所启发,但柏拉图的描绘真的能与《奥德赛》中的情节一一对应,甚至直接来自于后者(页73—74,93—95)?如果柏拉图的这几个主要对话的主要结构和文体形式都来自于《奥德赛》,还有必要认真研究柏拉图吗?难道柏拉图的工作紧紧是“将荷马编织的意象拆散,然后将它们编织成了一个更加精密的新意象”(页79)?

荷马与柏拉图之间的距离,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但总之有距离。柏拉图对荷马的运用无论与此前和此后的人多么不同,但总之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思想家完全算作同一类人,更不能让柏拉图无耻地寄居在荷马身上。荷马的文本固然算得上是柏拉图的语境(页51),但如果柏拉图只是在单纯地模仿荷马,又何来“创作”之说呢?又怎么谈得上“意图取代荷马,彻底改造希腊文化”(页57)?即便梭伦回到雅典后都打算“创作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版

<sup>①</sup> 参《王制》410d—412a。另参刘小枫:《诗化哲学》,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页197—199,347—348。诗人荷尔德林虽歌咏“哲学之光”,但那终究是诗人诗意的表达(参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页197—198。海德格尔在阐释这句话时,对“哲学”一词难得一见地嘴下留情)。

本，并意图取代荷马，彻底改造希腊文化”（页 57），更何况柏拉图！柏拉图的所有苏格拉底对话就算是意在把苏格拉底重新塑造成新的奥德修斯（页 82），但苏格拉底如果仅仅是在效颦奥德修斯，所谓的“新”又何以可能？古希腊宗教研究专家伯克特所谓“从柏拉图开始，并通过柏拉图，宗教在本质上已经不同于过去之所是”<sup>①</sup>以及“《王制》自身就意味着一种新诗，一种新神话”<sup>②</sup>这样的论断就变成无稽之谈了，更不用说柏拉图可能还有着“新周、故宋、王鲁”的心法呢。

此外，普拉宁克没有认识到，柏拉图的哲学观甚至与古代人（包括他的同时代人）都大异其趣，<sup>③</sup>兹事体大，片言难解，就目前的话题来说，哲学与诗歌有区别，但也可互补，正是这种差异才能相互有所进益，普拉宁克强行消除它们的差异实际上就拆除了一个互相依赖、相互扶持的稳定结构，即便浓墨重彩地强调的一方也会轰然倒塌，为之反倒败之。如果缺乏政治哲学的维度，大概就很难真正理解诗与哲学为何而争。<sup>④</sup> 柏拉图对荷马既然不是“生吞活剥”，自然也有所发明，只是究竟有哪些“回复”或“复古”，又有哪些“创新”，进言之，柏拉图（以及我们当今）如何“为往圣继绝学”，都需要认真研究。目前我们大约可以说，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既不让诗歌（荷马）战胜哲学（柏拉图）而一家独大，也不相反（且不说把柏拉图仅仅视为哲学的代言人这种简单化的做法该有多么糟糕），重要的是“重

<sup>①</sup> W. Burkert. *Greek Relig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年, 页 322, 转引自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戴晓光、彭磊等译，华夏出版社 2015 年, 页 276。

<sup>②</sup> 西格尔:《“神话得到了拯救”——反思荷马与柏拉图〈王制〉中的神话》，见张文涛编:《神话诗人柏拉图》，董赟等译，华夏出版社 2010 年, 页 245。

<sup>③</sup> 柏拉图批评当时的假哲学，试图拯救哲学于污名之中，参《王制》487c—d, 490a—e, 492a—b, 493d, 494a, 496a, 499e—500b, 536c。

<sup>④</sup> 《王制》497a, 500d。参张文涛:《哲学之诗》，前揭，页 54；另参娄林:《必歌九德》，华东师大出版社 2015 年, 页 138 以下, 页 204 以下。

新绷紧琴弦的两端”,<sup>①</sup>保持哲学与诗歌之间必要的张力。

当然,普拉宁克这本书即便仅仅专注于其中的一极,也值得一读,其间亦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作者特别强调《王制》和《法义》在文学形式和内容实质上连续性,甚至大胆地猜测柏拉图在创作《王制》时便已经有了《法义》的构思(页 20)。《克里提阿》的戛然而止,并非是该对话没有写完,而是如《奥德赛》中德摩多科斯的演唱被奥德修斯的哭泣突然打断一样,暗示它被一个更好和更高明的解释所超越了(页 23,62—63)。

而普拉宁克最后启发的便是以“萨满”(shamanism)来比较苏格拉底和奥德修斯的共同之处,这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似乎很难接受这种解释模式,<sup>②</sup>因为现代人早已把包括埃琉西斯和“萨满”在内的神秘主义思想方法放到了“科学”的手术台上解剖,并因其不够科学而视如敝履,至少已然扭曲和魔化——所谓“神秘”,其实质也许不是与科学相对立的迷信,而是我们的不理解。就奥德修斯和苏格拉底来说,下降到冥府、上升到神圣世界之类的意象本来是萨满的特质。<sup>③</sup> 这些解读虽未必成立,亦未见得

① 刘小枫为《弓弦与竖琴》撰写的“中译本说明”,参伯纳德特:《弓弦与竖琴——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前揭,页 i(本书修订本见华夏出版社 2015 年版)。后以《重新绷紧琴弦的两端》收入刘小枫:《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 2013 年。刘小枫先生十多年前就曾提出过这样的希望:“要是像我国经学的做法那样,将柏拉图作品中明里暗里引到和提到荷马的地方辑出来,一定相当可观”,可喜的是,美国福特汉姆(Fordham)大学的 P. G. Lake 于 2011 年提交的博士论文,《柏拉图的荷马对话:〈王制〉对荷马史诗的引用、释义和化用》(*Plato's Homeric Dialogue: Homeric Quotation, Paraphrase, and Allusion in the Republic*),虽然仅仅涉及到柏拉图的《王制》,但其详实的分析堪称模范(该书大约相当于中文 40 万字的篇幅)。

② Kateri Carmola, “Review of *Plato Through Homer*”. I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2, No. 4 (Dec., 2004), p. 831.

③ 除了普拉宁克所引用的著作外,还可参考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宗教思想史》,晏可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年,尤其卷三,页 953 以下,另参 C. Pratt, *An Encyclopedia of Shamanism*. NY: 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7; M. N. Walter (et al) eds. *Shamanism: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Beliefs, Practices, and Culture*.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 2004; 汉语学界亦有多部研究专著。

深入，却也不无参考价值，甚至还有可能由此而打开“文明”之外和之前一个更为神圣的世界。

程志敏

2015年11月20日

## 致 谢

能够使用《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无疑是一件实实在在令人享受的事。我从头至尾都以这套丛书的希腊文为蓝本,唯有少数情况为了方便,参阅了“珀尔修斯网站”(Perseus Digital Library, Classics Department, Tufts University)。在翻译和解释柏拉图与荷马作品的过程中,我还参考了以下著作:拉蒂摩尔所译《奥德赛》(Richmond Lattimore, *Odyssey*; Harper and Row);布鲁姆所译《王制》(Allan Bloom, *Republic*; Basic Books);伯纳德特所译《会饮》(Seth Benardete, *Symposiu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尼柯尔斯所译《斐德若》(James Nichols, *Phaedru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以及康福德的《柏拉图的宇宙论》(Francis Cornford, *Plato's Cosmology*; Bobbs-Merrill)。

该项研究的部分成果之前曾先后提交给如下机构: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哲学与政治科学系,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政治科学系,希腊政治思想社会(Society for Greek Political Thought)所主持的会议,加拿大政治科学协会(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和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感谢以上所有给予我帮

助的人。同时感谢密苏里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主任贾勒特(Beverly Jarrett)女士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大力支持,以及富有耐心、一丝不苟的拉戈(Jane Lago)编辑和文达(Annette Wenda)编辑。

讨论柏拉图与荷马,最好是在如下的场景与氛围之中,即如同柏拉图对话设定的那些,或如《奥德赛》插曲所记述的那些更为友善亲密的氛围之中——人们聚集在一起,参与讨论的每个人都有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论他们的邂逅是不期而遇,还是每天的惯例,亦或是期盼已久的约会:与老师或者学生对话;与朋友交谈;与诗人和商人进行友好的论辩;或者在少数情况下,也与避开了共同权利(collegiality)保护的学者们聊天;但没有什么能比与自己所爱的人交谈更受欢迎、更令人满意的了。许多类似于这样的讨论形成了我对文本的理解,并有助于解决我在这本书中所关注的紧要问题,我对此感激不尽。

此外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事。当年,我亦少不更事,虚度光阴,还曾加入过一支摇滚乐队,鼓手不知为何,非要取名叫亚特兰蒂斯(Atlantis)。未成年的我,还曾偷偷溜进过一家夜总会,去看戴维斯(Miles Davis)的专辑《即兴精酿》(Bitches Brew)的表演;我还曾在一家几乎空无一人的地下酒吧,倾听过迟暮之年的明格斯(Charles Mingus)的演奏;每逢伊文思(Bill Evans)来镇上表演三重奏的时候,我都会去观看他的演出。我还看完了尼姆佐维奇(Aron Nimzowitsch)和阿廖欣(Alexander Alekhine)的象棋比赛的全过程,并在一番研究之后,冒险参加了周三晚举行的锦标赛。并且还看过一些无意中发现的书籍;凯恩(Alice Kane)的丛书和故事集;意外收到了熟人和远亲作为礼物送来的书籍。我还曾学着与一个威尔士人一起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谢天谢地。此外还有第一次观看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的《400 击》(400 Blows),或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穷街陋巷》(Mean Streets)。

Streets),亦或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同流者》(*Conformist*)。我还去见过北极光;领略过巍峨的落基山脉和广袤的大草原;还曾在卡乌阿瑟湖(Kawarthas)一处借来的小农舍里看月出;看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扇门。

## 目 录

中译本说明(程志敏) / 1

致谢 / 1

旅程:柏拉图与荷马 / 1

下降:《蒂迈欧》与《克里提阿》 / 27

上升:《斐德若》 / 70

家与床 / 120

译后记 / 139